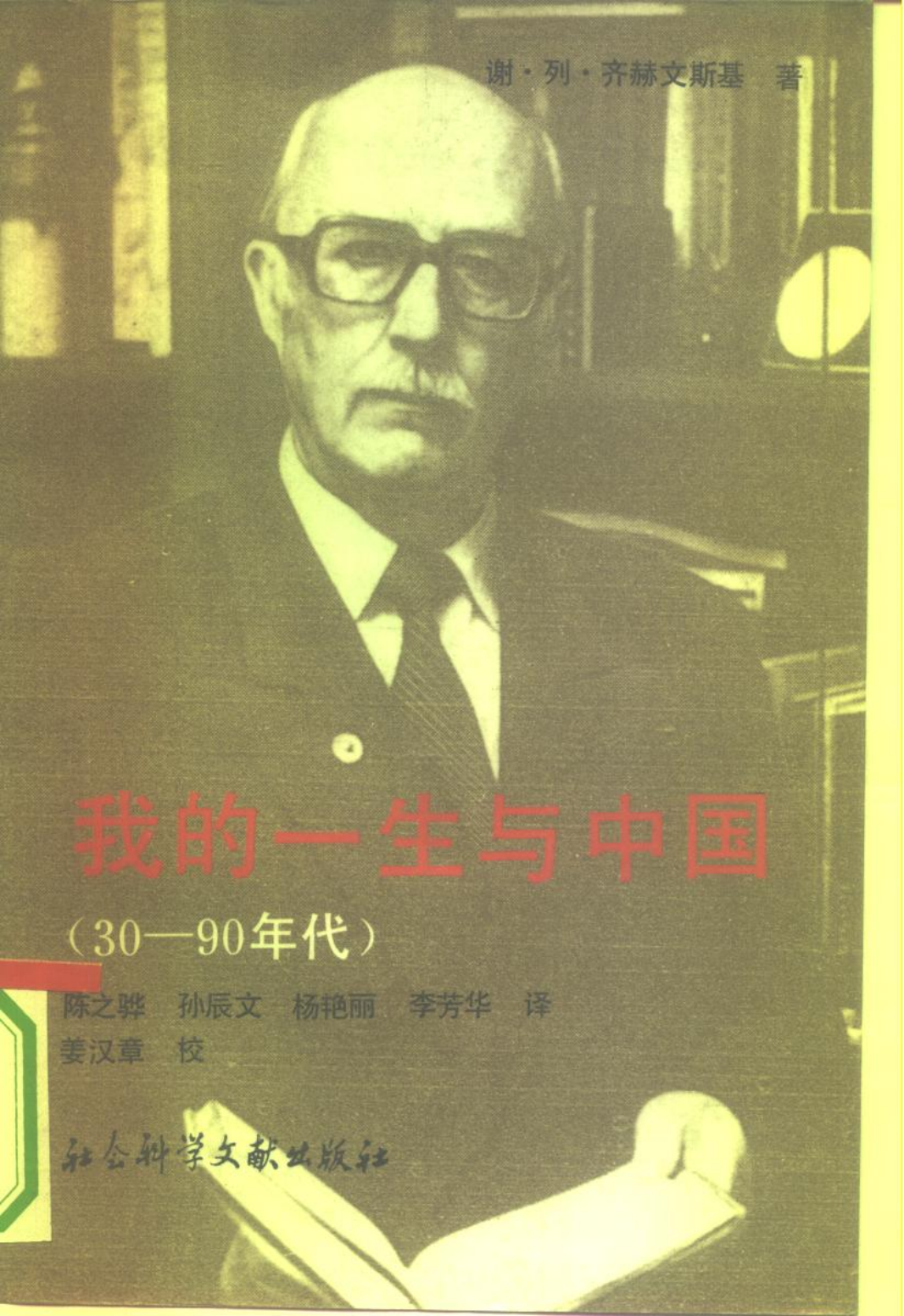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a mustache and glasses, wearing a suit and tie.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is slightly blurred, show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bookshelf or a study.

谢·列·齐赫文斯基 著

# 我的一生与中国

(30—90年代)

陈之骅 孙辰文 杨艳丽 李芳华 译  
姜汉章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我的一生与中国

(30—90年代)

谢·列·齐赫文斯基 著

陈之骅、孙辰文<sup>译</sup>  
杨艳丽、李芳华<sup>译</sup>  
姜汉章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  
(30-90-е годы)

---

(据前苏联科学出版社1992年俄文本译出)

我的一生与中国  
(30—90年代)

谢·列·齐赫文斯基 著  
陈之骅 等译 姜汉章 校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1/32开本 4.125印张 10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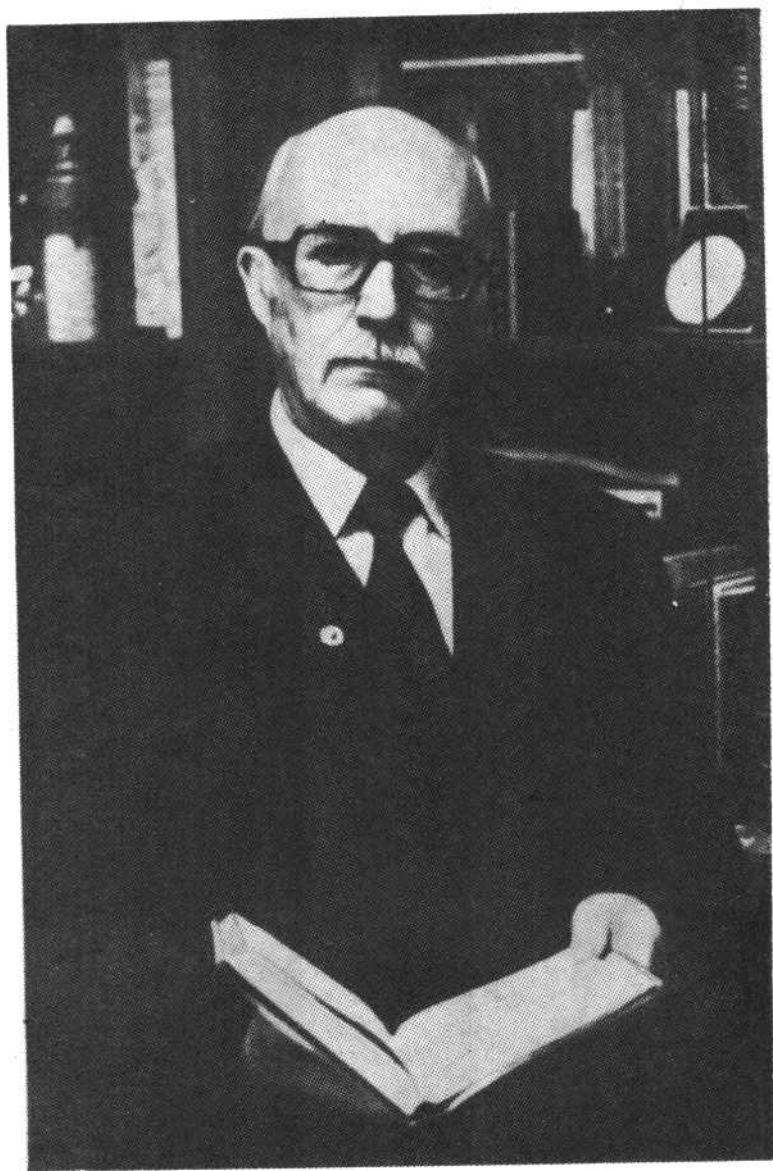
850×1168

1994年8月第一版 1994年8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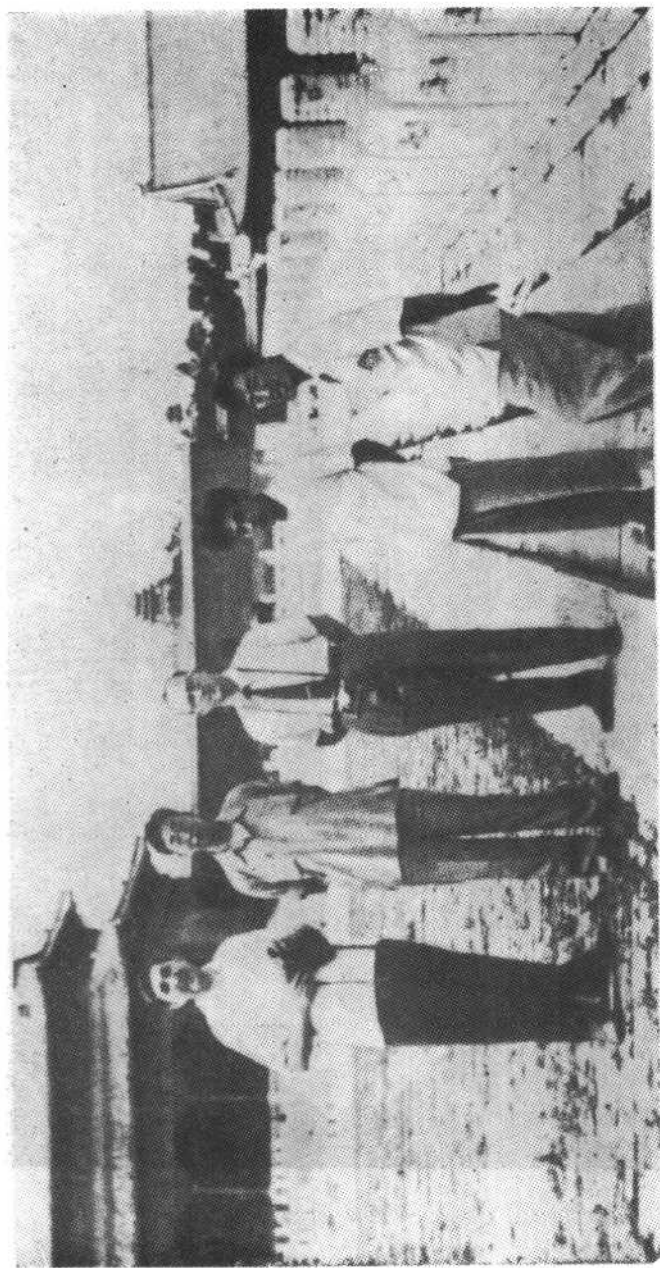
ISBN 7-80050-550-2/K·61 定价: 5.60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本书作者—谢·列·齐赫文斯基院士。(1989年)



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T.A.茹科夫，作家、翻译家戈宝权（左边）和高莽（最右边）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57年）



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出席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1949年11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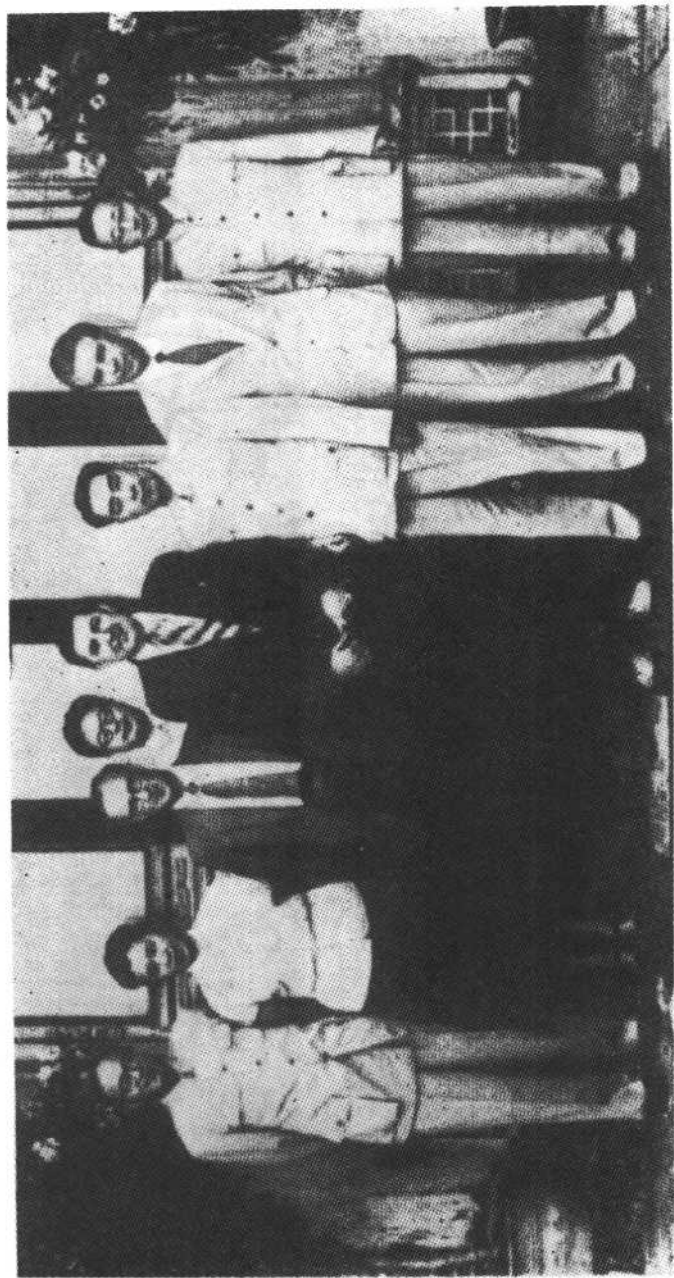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在莫斯科友谊宫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博士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做报告（1966年11月）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女电影演员白杨游览  
希姆基水库。（19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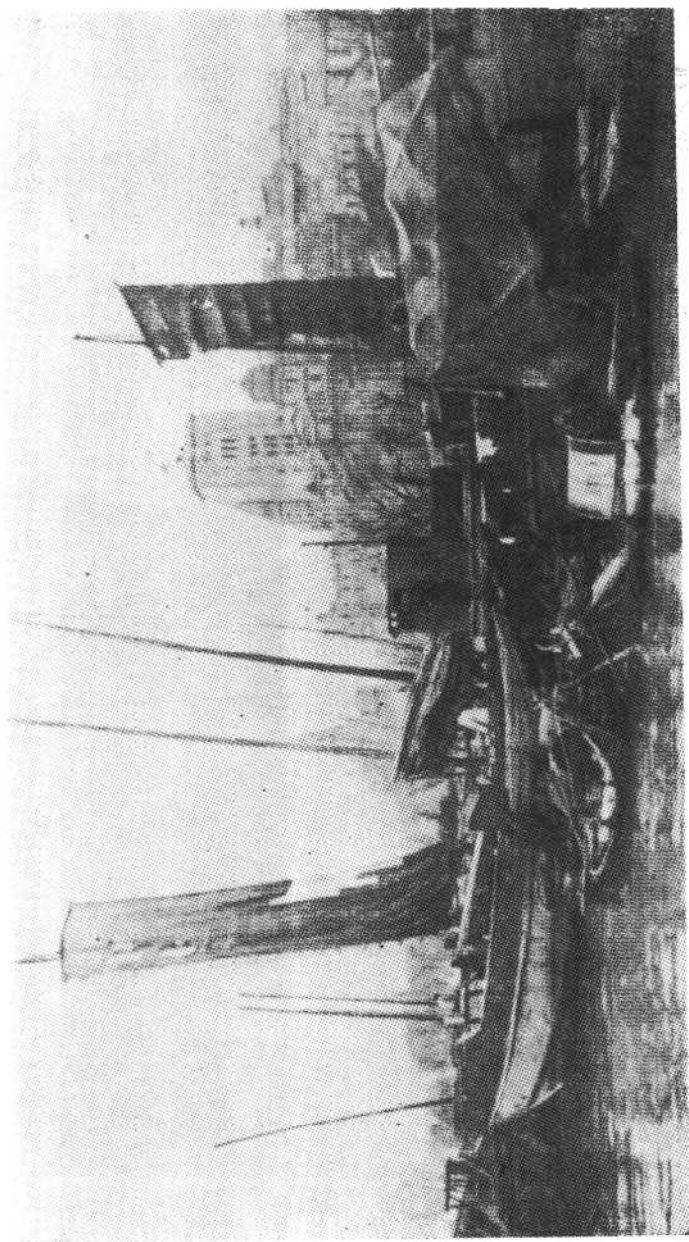
在莫斯科友谊宫隆重举行纪念宋庆龄诞辰90周年的  
大会。（1980年）



周恩来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T.A.茹科夫。（1957年于北京）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偕夫人在莫斯科，最右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杨守正。（1982年）



上海外滩。（1950年1月）

## 作者简历\*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教授，1918年9月1日生于彼得格勒，早年曾在列宁格勒大学汉学专业学习。1939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北平总领事馆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49年10月2日起担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临事代办和参赞。此后又担任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参赞和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曾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出席过几届联合国大会，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的苏联代表。在苏联外交部中央机关中曾领导亚洲司和计划局，并任外交史研究室主任。曾任外交学院院长。有特命全权大使级外交官衔。

1945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1953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57年起任教授，1968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81年起任院士，写有学术著述300余种，其中包括以下一些专著：《孙中山，外交政策梗概和实践》、《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改良运动和康有为》、《中国近代史》、《一位中国革命家的遗训》、《满清在中国的统治》、《中国历史与现实》、《世界历史与中国》以及《中国历史人物与事件》等。

曾多次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国际档案学家大会和欧洲汉学家大会。现任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罗斯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关系和俄国对外政策史》学术委员会主席，俄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

\* 这是本书作者1993年3月专门为中译本所写的简历。

## 前 言

俄中睦邻友好关系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两国之间不断发展互利贸易、友好往来、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丰富。

尽管19世纪末，沙皇政府在争先恐后地把中国这个封建帝国划为各国“势力范围”的半殖民地国家时，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沆一气，但是，俄罗斯进步的民主主义社会人士始终不渝地十分同情中国在孙中山博士领导下的主张共和政体者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这些同情在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时通过现实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军国主义失败后，又通过支持中国民主力量统一战线而得到了加强，这些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引导人民革命走向胜利并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提请本书读者关注的是，本书作者总起来说有55年多的时间一直从事研究拥有11.3亿人口和绵延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我们东方邻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作者有幸能在这些岁月的进程中参与执行我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工作。

很遗憾，生活的安排使我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不得不在各个不同的年代既要从事学术领域(世界通史、苏联外交政策史和国际关系史)大量的其他各种问题的研究，从事学术组织和教学方面的工作(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管理局、苏联外交部外交学院、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苏联全国历史学家委员会、国际历史学委员会执行局)，又要从事实际的外交活动(在苏联驻英国和日本大使馆、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行动规划局、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尽管这些工作开阔了我的整个视野，使我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但却使我不能全然地献身于中国问题的研究。

然而，在每次命运转折的时刻，中国从我走上独立创作道路伊始，就一直处在学术兴趣的中心。所以，1989年春，为庆祝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远东问题》杂志编辑部建议我为杂志撰写几篇回忆录，向年轻读者谈谈我在汉学研究方面走过的道路和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情况，我接受了这一建议，但要附加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我没有时间查阅档案文件资料，因此，我的回忆录仅仅是我个人的回忆。编辑部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在1989年出版的两期杂志（第3期和第4期），以及1990年的两期杂志（第4期和第5期）上登载了我的回忆录。

朋友们经常抱怨缺乏有关中国的文献，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决定以单行本形式将这些片断的回忆出版，并对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做了补充和为许多照片提供了文字说明。

现在我把这本书献给严肃的读者去评判，我想再次提醒读者的是，作者绝不奢望完整无缺地叙述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因为我在撰写回忆录时，既没有仔细研究过档案材料，也没有对苏联和中国的文献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然而我希望，本书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满足苏联社会对苏中关系史、对我们伟大邻国中国的历史和当代生活日益增长的兴趣，并介绍苏联汉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以利于发展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事业。

C 齐赫文斯基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 1 )  |
| 第二章..... | ( 36 ) |
| 第三章..... | ( 67 ) |
| 第四章..... | ( 98 ) |

## 第一章

我对东方国家，其中也包括对中国产生兴趣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与我遥远童年的回忆有关的早年的读物中，可以说得上来的是《日本童话集》的俄译本，这些童话讲述了狡猾的胡獾、恶毒的人妖以及善良的日本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风俗习惯。在20年代末期，有那么几年，我的双亲曾在奥拉宁鲍姆（今罗蒙诺索夫）城外大伊若拉村租了一座别墅度夏，在这里可以望见芬兰湾美丽的景色。我和一些顽皮的小伙伴在邻近别墅围栏旁的一棵大树上构筑了一个象瞭望哨似的东西。我们站在上面用望远镜观看海湾航道上来往的船只，并梦想着到遥远的地方去旅行。在邻近的另一座别墅中住着著名的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我父亲经常和他交谈，而我也无意之中听到了这位学者讲述的很多有关中国及其文化和历史的故事。这对我日后选择汉学这一职业无疑是有影响的。在中学时期，一些到过中亚细亚的俄罗斯旅行家，如普尔热瓦利斯基、波塔宁、奥布鲁切夫、佩夫佐夫、罗博罗夫斯基、索斯诺夫斯基、科兹洛夫以及斯文海定<sup>①</sup>等人写的书曾使我神往。我还记得和A.E.费斯曼、O.Ю.施米特、Л.И.谢尔巴科夫院士等一些考察过帕米尔高原和中亚其他地区的人，以及著名的北极考察家P.Л.萨莫伊洛维奇教授会见的情况。

在30年代，我们高年级的中学生，和所有的苏联人一样，十分关注报刊上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

---

<sup>①</sup>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年，瑞典旅行家。曾对罗布泊做过考察。——译者

的报道。我们对中国东北人民在1931年9月成为日本侵略的牺牲品深表同情。我参观过存放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参观过列宁格勒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中有关中国的藏品；参观过1934年夏天，画家徐悲鸿来苏联举办的中国绘画作品展览；1935年春天，在梅兰芳和他的京剧团来苏联巡回演出时，观看过他的表演；我还在俄国地理学会听过不少有关马可波罗和其他俄国的、外国的旅行家们考察经历的讲演。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我学会汉语，以便了解我们伟大的邻国——中国古老和现代文化的愿望。

1935年夏天，我顺利地通过了列宁格勒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学院语言系的入学考试。这所学院在一年以后被改组为列宁格勒大学的语文系。

很多苏联著名的汉学家都当过我的老师。我们大学生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们讲课，其中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讲的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学，Б.瓦西里耶夫教授讲的中国现代文学，舒茨基教授讲的中国哲学，Г.叶菲莫夫讲的中国近现代史，К.拉祖莫夫斯基讲的中国造型艺术，特别是中国肖像画，Ю.布纳科夫和М.赫万讲的中国文字。教我们日语的是О.索洛维约娃。我们的系主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И.梅夏尼诺夫院士，他给我们开普通语言学课程。语言学引论是Р.绍尔教授讲的。教语音课的是Л.谢尔巴教授。在我们系里任教的还有一批我国东方学界的巨擘，如阿拉伯学专家И.克拉奇科夫斯基院士，印度学专家Ф.谢尔巴茨科伊院士，埃及学专家В.斯特鲁韦院士，日本学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康拉德以及伊朗学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Е.别尔捷利斯等。跟这些学者们频繁往来，提高了我们的东方学素养。但是，在教员中没有能教汉语口语的人，因此我们汉语专业的学生只得满足于听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语音课的录音。

在这些年里，我十分积极地参加了学生科学小组的活动，小